

出版  
文化出版社  
花木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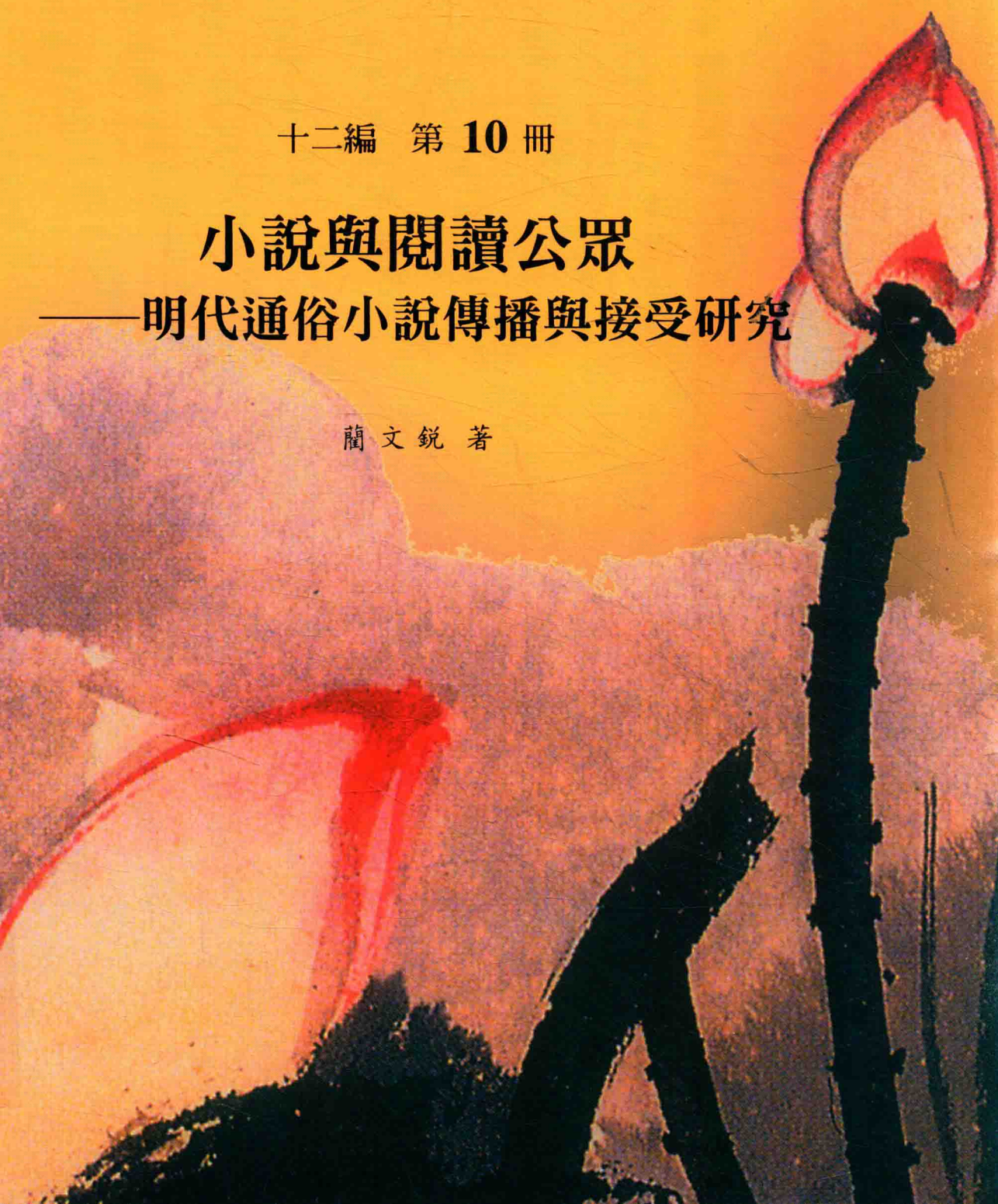
曾永義  
主編

# 輯刊 研究 文學 古典

十二編 第 10 冊

## 小說與閱讀公眾 ——明代通俗小說傳播與接受研究

蘭文銳 著



# 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十二編

曾永義主編

第10冊

小說與閱讀公衆  
——明代通俗小說傳播與接受研究

藺文銳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小說與閱讀公眾——明代通俗小說傳播與接受研究／蘭文銳  
著 -- 初版 -- 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5〔民104〕

目 2+166 面：19×26 公分

（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十二編：第10冊）

ISBN 978-986-404-408-5（精裝）

1. 明代小說 2. 文學評論

820.8

104014983

ISBN- 978-986-404-408-5



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十二編 第十冊

ISBN：978-986-404-408-5

小說與閱讀公眾  
——明代通俗小說傳播與接受研究

作 者 蘭文銳

主 編 曾永義

總 編 輯 杜潔祥

副總編輯 楊嘉樂

編 輯 許郁翎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社 長 高小娟

聯絡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七二號十三樓

電話：02-2923-1455 / 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hml810518@gmail.com](mailto:hml810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5年9月

全書字數 122909字

定 價 十二編 26冊（精裝）新台幣 48,000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小說與閱讀公衆  
——明代通俗小說傳播與接受研究

藺文銳 著

## 作者簡介

藺文銳（1972年～），古代文學博士，中國戲曲學院戲文系副教授。主要從事古代小說傳播與戲曲文獻的相關研究，先後到日、俄、英等著名大學進行教學交流。主持北京市教委社科科研專案（《詩與瞽：中國戲劇的詩樂綜合研究》、《程硯秋藏戲曲抄本整理與研究》），在中文核心期刊發表學術論文若干篇。編著《大學語文》（北京科學技術出版社，2001年，21萬字），《藝文類聚·祭文》（中華書局，2010年，15萬字）。

## 提 要

明代通俗小說的文本傳播是否達到大眾化程度，小說文本傳播的受容層如何，研究者眾說紛紜。本文立足於「小說的印刷文本」，著眼於小說文本傳播的兩極——傳者和收容層，以「小說與閱讀公眾」為中心，側重討論作為商業印刷媒介文化一部分的明代通俗小說文本傳播的特點。

小說，尤其以文本的形式，能夠在大眾中傳播、被大眾所接受，特別依賴物質條件的成熟和傳播環境的形成。明代社會中後期，商業資本介入圖書出版發行領域，促進民間書坊的規模化發展，使小說文本的大眾化出版成為可能；商業交通與郵驛發達，拓寬了小說文本傳播的管道，小說社會流佈方式多樣。可以說，明代中後期，一個雛形的大眾傳播社會已基本形成。小說從此進入到主要以文本形式和讀者閱讀為主的傳播時代。

以江南為中心的明代城市化進程中，市民階層不斷成長和壯大，成為通俗小說最可能的閱讀公眾。小說的閱讀依賴於一定的物質環境與精神環境，在性別、年齡、教育、經濟、審美、地域、文化及宗教等因素影響下，通俗小說的閱讀公眾形成不同的讀者層。讀者群的差異不僅形成不同的閱讀傾向，也影響到小說編撰者——邊緣文人與書坊主對於小說的編撰方式，甚至也影響到小說文體、流派及文本特點的形成。明代通俗小說是大眾讀者的文學。



# 目 次

緒 論	1
第一章 商業傳播媒介與小說傳播	7
第一節 小說的商業化出版	8
第二節 小說的社會化流佈	15
第二章 城市化與市民階層的發展	21
第一節 城市化進程	21
第二節 城市娛樂文化與市民階層	23
第三章 小說閱讀影響因素與讀者層	33
第一節 環境因素與小說接受	35
第二節 讀者因素與小說接受	38
第三節 小說書價與讀者層分析	44
第四章 文本因素與小說閱讀	51
第一節 語體與小說閱讀	51
第二節 文體與小說閱讀	52
第三節 題材與小說閱讀	54
第四節 評點與小說閱讀	60
第五節 插圖與小說閱讀	64
第五章 小說編者與小說傳播	73
第一節 職業化文人與小說編撰	73
第二節 書坊主與小說傳播	75
結 語	81
附錄：明代通俗小說傳播一覽表	83
參考文獻	97

附錄一 瞽：上古時代的遊吟詩人	103
一、職業化	105
二、伎藝化	107
三、儀式化	108
附錄二 上古說唱伎藝考	111
一、說唱詩人：「瞽矇」與「瞽史」	112
二、早期「講史家」：「誦訓」與「訓方氏」	115
三、傳承歷史碎片的「齊東野人」	117
附錄三 孔子與瞽者	123
一、瞽者為樂官	124
二、瞽樂官傳承禮樂文化	124
三、孔子與瞽樂官	125
附錄四 眾聲喧嘩：《紅樓夢》「說唱」解	127
一、作為伎藝的說唱	128
二、作為情節有機構成的說唱	134
附錄五 中國古典戲曲在日本的傳播、譯介與 研究概略	137
一、中國古典戲曲在日本的傳播	138
二、日本對中國古典戲曲的譯介	141
三、日本對中國古典戲曲的研究	143
附錄六 北京大學館藏程硯秋玉霜簾藏曲述略	149
一、玉霜簾藏曲與金匱陳氏	150
二、玉霜簾藏曲之價值	153
三、玉霜簾藏曲的整理	156

## 緒 論

我們生活在物質的世界裏，依靠物質而生存，使用物質手段改造環境。這是關於人類活動的一個基本事實。如果以此為依據來觀察文學，那麼，文學便會表現為一種生存和改造環境的方式，表現為因某種社會需要而產生、依靠特定物質手段而傳播的事物。我們會看到，文學的內容往往反映了人們的社會需求，而文學的形式則是關於傳播的各種物質因素的凝結。

關於文體變遷，通常是被當作審美風尚變遷的外在表現；事實上，精神的選擇須接受物質條件的制約；一切完整的文學過程都包括創作、傳遞、接受三個環節，作品的形式由這三者的聯繫方式決定。每一種文體都有其物質承擔者。文學是發端於口頭而貫穿於書面的運動，傳播手段和傳播方式的嬗替是文體變遷的最直接的動機。

提及明代小說，或稱其「通俗小說」、或稱其「市民文學」、或稱其「大眾文學」，種種稱謂意味著明代小說確乎具有廣泛的社會影響。考慮到小說文本傳播的實現需要更高的物質成本，研究者多將小說的這種「通俗化」繁榮局面歸功於小說的口頭說唱傳播和戲曲改編傳播；而對於小說的文本傳播能否達到大眾化程度表示懷疑。<sup>〔註1〕</sup>但事實是，通俗小說以印本大量行世始於

---

〔註1〕 相關討論見石昌渝《通俗小說與雕版印刷》，《文史知識》，2000年第2期；郭英德《元明的文學傳播與文學接受》，《求是學刊》，1999年第2期；陳大康《明代小說史》，上海文藝出版社，2000年，頁173~177；磯部彰《關於明末〈西遊記〉的主體受容層研究》，《集刊東洋學》第44輯；大木康《關於明明白話小說之作者與讀者——據磯部彰氏之論》，《明代史研究》，1984年第12期；何谷理（Robert E.Hegel）《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Factor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raditional Novel（章回小說發展中涉及的經濟技術因

明代。(註2)作為商業印刷文化和消費文化的產物，小說必然是在滿足旺盛而多樣的閱讀需要和閱讀欲望。那麼，明代小說的文本傳播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實現了「大眾化」？小說的「閱讀公眾」包括那些群體？對於小說來講，這應該是一個重要的問題。因為閱讀並非完全是靜態的、被動的行為，「我們的考察應該從作品的創作一直追逐到讀者閱讀後的反響，其中包括作品到達讀者手中的方法與途徑，而讀者群體帶有傾向性的反響，反過來又是制約後來創作的重要因素」；(註3)這些「傾向性反響」最終沉澱在小說的文本之中，甚至形成文體特徵。但是由於「公眾」在任何時代實質上都是一個「能指」明確而「所指」含糊的概念，更由於除了文本，難以得到其他可以分析古代公眾閱讀小說的真憑實據，因此對於明代小說的所謂「大眾化」問題，總是難得其真。本文的出發點之一，即是試圖借助對明代社會各階層的經濟學的分析，討論通俗小說文本接受的最大可能性。——

## 一、明代小說傳播研究綜述

明代小說家在什麼意義上稱定小說？他們創作小說的動機、目的怎樣，又如何構思、寫作小說？明代的讀者怎樣欣賞、接受小說？明代小說批評家怎樣批評小說？傳統上對每個問題都有研究，但顯得相對孤立；現代傳播學理論將之構成一個有機的、相互影響的過程，並借鑒社會學、心理學、人類學、接受美學等理論，形成比較開放的理論體系，具有很強的實踐性、操作性，比較適合動態的分析與研究。傳播學理論為全面觀照小說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視角，讓我們更加關注過去忽略或重視不夠的問題。同時明代通俗小說也屬於「大眾文化」的範疇。西方的「大眾文化」概念，強調大眾文化的生存境態的「市場性」(市場需求第一)、生產目的的「盈利性」(投資效益至上)、製作手段的「資本性」(資本運作壟斷)和「製作性」(機械複製、批量生產、科技含量)、傳播方式的「廣告性」(廣告策略、媒體炒作)和「壟斷性」(文化資源及文化市場壟斷)。(註4)這種文化屬性也特別提醒我們關注明代小說在商業化文化背景下形成的傳播特點。

---

素)》，Han-hsueh yen-chiu.

(註2) 石昌渝《通俗小說與雕版印刷》，《文史知識》，2000年第2期。

(註3) 陳大康《明代小說史》，上海文藝出版社，2000年，頁14。

(註4) 童慶炳等《「人文精神與大眾文化」筆談》，《文藝理論研究》，2001年第3期。

大量運用現代傳播學的理論與模式研究明清小說始於 90 年代中後期。這不是說此前沒有這方面的研究。(註 5) 盧明純《明代坊刻小說興盛探因》一文就指出，明代嘉靖以後，書坊集編輯、出版、發行於一體，成為刊行小說的主力軍；書坊主有時也是小說編者，或聘請文人編撰小說，促進了小說的創作與出版，充分滿足了市民的需要；書坊間的競爭使小說插圖爭奇鬥妍。這實際上就是傳播學意義上的「傳播者」、「傳播媒介」研究。稍後的研究者自覺運用傳播學理論或就元明清小說傳播的某一環節，如傳播技術、傳播方式、傳播者進行研究，或對小說傳播進行宏觀的、系統的觀照。前者如白永達、白蕾的《作者·受眾·傳播條件與市民文學》，論及印刷技術的革命促成明清小說的傳播方式由口頭向書面轉變，市民階層的出現形成廣泛的受眾群，形成「民間口頭創作——低層文人加工潤色——學者名家品評倡導」的創作、推廣機制。後者如郭英德的《元明的文學傳播與文學接受》，宏觀地分析了包括明代小說在內的元明文學書籍，通過交換、書坊、書市、藝人等傳播媒介與渠道，以人際傳播、商業傳播和娛樂傳播的方式，被不斷地傳抄、傳唱、刊刻、翻刻、選刻，「實現從傳播者到受眾的所有權轉換」，形成不同的抄本、印本和選本；元明刻書的接受對象不出皇家、貴戚、富商或文人的範圍；受眾需求與書籍生產之間因傳播而具有密切的互動關係。這是一篇分析較全面的單篇論文。而李玉蓮從 1998 年起陸續發表的四篇論文（碩士論文的一部分），以及她的博士論文《中國古代白話小說戲曲傳播論稿》（未出版），都著眼於「是誰（傳播者）用什麼方法（媒介與渠道）將這些白話小說戲曲保存傳播至今」，從傳播者、媒介與渠道兩方面，比較系統地勾勒了宋元明清以來小說戲曲的傳播狀況，是一部古代白話小說戲曲的傳播史。

特別關注明清尤其明代小說傳播現象的，有石昌渝、陳大康、宋莉華、李舜華等研究者。(註 6) 石昌渝《通俗小說與雕版印刷》指出，嘉靖時期印刷業的繁榮促成通俗小說的商業化，出版商的運作又影響到通俗小說的創作；

〔註 5〕 盧明純《明代坊刻小說興盛探因》，《四川圖書館學報》，1991 年第 1 期；白永達、白蕾《作者·受眾·傳播條件與市民文學》，《陰山學刊》（社科版），1997 年第 3 期；郭英德《元明的文學傳播與文學接受》，《求是學刊》，1999 年第 2 期；李玉蓮《中國古代白話小說戲曲傳播論》，山西教育出版社，2005 年。

〔註 6〕 石昌渝《通俗小說與雕版印刷》，《文史知識》，2000 年第 2 期；陳大康《明代小說史》，上海文藝出版社，2000 年；李舜華《明代商賈與通俗小說的繁興》，《中國典籍與文化》，1999 年第 4 期；宋莉華《明清時期的小說傳播》，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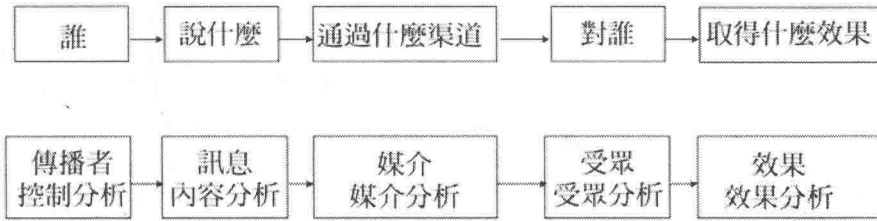
翻刻帶來小說的不同版本和內容的改變；小說刻本高昂的售價，表明通俗小說的讀者不是底層人民，而是官紳地主商人及其子弟，由此造成通俗小說熱衷穿插詩詞和駢文儷句，講史小說大量照搬史書。李舜華的《明代商賈與通俗小說的繁興》分析明代萬曆前後，作為通俗小說出版者、編撰者的書賈（書坊主）發生變化，由此形成小說題材、章回體制、版本刻錄等方面的特點。她的博士論文《小說的興起——以明萬曆嘉靖以後的小說為中心》（未出版）特別考慮了傳播因素在小說文體形成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宋莉華 1999 年起發表的有關論文，側重仔細解讀現存的明清小說文本，分析總結小說插圖、小說評點、小說方言的特點及其傳播功能和傳播效果，探討明清小說與傳播機制之間的關係。陳大康《「熊大木現象」——古代通俗小說傳播模式及意義》不僅僅關注傳播現象與事實，而是通過透視傳播現象，分析小說發展史的某些問題。陳大康對小說傳播學的研究成果，體現在他的《明代小說史》中。小說史採用「明清小說在作者、書坊主、評論者、讀者以及統治階級的文化政策這五者共同作用下發展」的研究模型撰寫。

目前對於明清小說的傳播學研究在不斷深化，由圖解傳播學理論而逐漸深入文本，揭示了小說傳播的大量現象與事實，分析了小說傳播各個環節的特點及某些環節之間的互動關係；中國古代小說獨特的傳播現象漸漸凸顯出來；傳播與小說文體的關係受到關注，傳播問題開始進入文學史研究者的視野。但由於運用傳播學理論研究中國古代小說剛剛起步，研究中也存在一些傾向，比如格外關注傳播者、傳播媒介與渠道的研究，對作者、受眾的研究不夠深入；重視傳播過程中各個環節及傳播現象的線性研究，對傳播過程各個環節之間的交互特性重視不夠；討論傳播對小說的正面作用，較少談及負面影響。有些薄弱環節如傳播與文本的互動關係、社會文化對傳播的影響等問題，有待進一步的研究。本文擬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著重探討有關明代通俗小說傳播的兩極——「傳者」和「受容層」的問題。

## 二、本文的論述範疇及研究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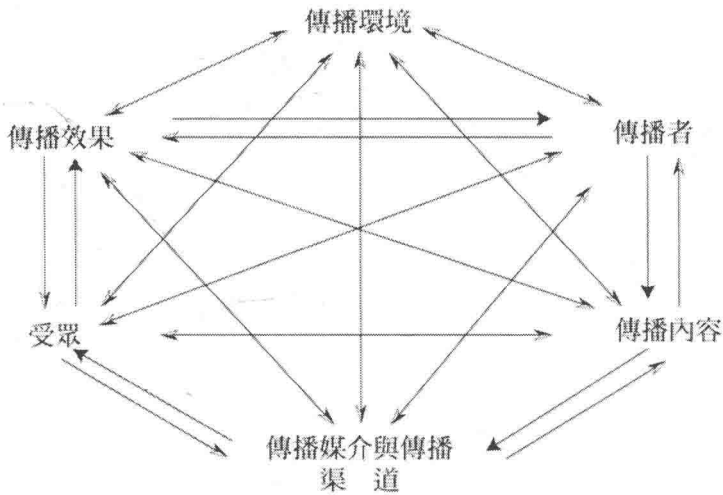
小說傳播研究的理論基礎大多是基於著名的傳播學「五W」傳播模式，即美國政治學者哈羅德·拉斯維爾（Harold Lasswell）在 1948 年發表的題為《傳播的社會職能與結構》的文章中用來說明傳播過程的一個問句，誰（Who）說了什麼（Says what），從什麼途徑（In which channel），向誰說（To whom），

有什麼效果（With what effect）？



### 傳播模式

小說的傳播同樣是由傳播者、傳播內容、傳播媒介與傳播渠道、受眾、傳播效果形成的一個較為完整的傳播模式。



本文著眼於「小說的印刷文本」，以「小說與閱讀公眾」為中心，側重研究作為商業印刷媒介文化一部分的明代通俗小說文本的傳播與接受。

第一章著重討論明代小說與印刷媒介的關係。小說閱讀行為的實現以小說文本為前提。明代商業資本的介入促進民間書坊的規模化發展，印刷媒介的商業化使通俗小說文本的商業化出版成為可能；明代商業交通與郵驛的發達，開拓了通俗小說文本傳播的渠道，小說社會流佈方式多樣，擴大了通俗小說的閱讀範圍。印刷媒介的發達程度決定了明代通俗小說傳播與接受的階段和特點。

第二章探討小說文本接受的最大可能性問題。明代中後期，以江南為中

心的商業經濟極度發達，促進了城市化進程與市民階層的發展，拓展了通俗小說的閱讀公眾。通過市民收入及消費與書價的分析，初步判斷通俗小說的接受層應當是大眾的。

第三章主要討論小說閱讀的制約因素。小說的閱讀依賴一定的物質空間與精神空間。地域文化、宗教及小說觀念構成小說接受的公共空間。個體閱讀行為受教育水平、經濟能力、性別、年齡及審美趣味等因素的影響，明代通俗小說的閱讀公眾形成不同的群體。並著重分析了女性讀者、商人讀者與才子佳人小說、歷史演義及豔情小說的接受關係。

第四章從小說文本出發，探討構成文本的諸要素如文體、語體、題材、評點及插圖對於閱讀的影響。

第五章則從小說編撰者——邊緣文人與書坊主的編撰方式說明通俗小說的商業化和大眾化傾向。

# 第一章 商業傳播媒介與小說傳播

小說，尤其以文本的形式，能否在大眾中傳播、被大眾所接受，特別依賴物質條件的成熟和傳播環境的形成。而明代前期，洪武到成化（1368～1488），印刷技術尚不發達，書籍刊刻主要集中在官府，「國初書版，惟國子監有之，外郡縣疑未有，觀宋潛溪《送東陽馬生序》可知矣。宣德、正統間，書籍印版尚未廣。」<sup>〔註1〕</sup>陸容《菽園雜記》卷十刻書規模小、效率低、成本高，抄寫仍然是書籍流傳的主要方式。<sup>〔註1〕</sup>因此明代前期通俗小說的傳播以說唱傳播和抄本傳播為主。永樂年間（1403～1425）編纂的《永樂大典》中抄錄了26卷元明之際的「平話」。成化（1465～1488）時書坊刊印的小說雜書，「農工商販抄寫繪畫，家蓄而有之。」<sup>〔註2〕</sup>葉盛《水東日記》卷十二「小說戲文」民間書坊尚未普遍發展，以書坊刻本為主的小說文本形式和以讀者閱讀為主的小說傳播方式遠未普及。小說閱讀帶有偶然性和傳奇色彩。<sup>〔註2〕</sup>按照當時的印刷技術和出版狀況，明初問世的長篇小說《三國志演義》和《水滸傳》似乎還不大可能大規模出版和廣泛傳播。<sup>〔註3〕</sup>《三國志演義》問世之後的一百多年因此被稱為

---

〔註1〕《明太祖實錄》卷246記載，洪武十五年（1382）從福建、湖廣、江西、浙江、直隸招1910個書工，專事抄寫。元末明初華亭人孫道明抄書數千卷；宋濂《宋學士文集》卷二「每假借於藏書之家，手自筆錄」；《明史》卷137「劉崧傳」：劉崧「家貧力學，寒無爐火，手皸裂，而抄錄不輟」。《藏書紀事詩》卷2記載崑山人葉盛「服官數十年，未嘗一日輟書，雖持節邊檄，必攜抄胥自隨」。

〔註2〕錢希言《桐薪》卷三記載，明武宗（1506～1521）曾令太監深夜出宮，以五十金重價購回《金統殘唐記》小說，以供「御覽」。

〔註3〕洪武七年（1374）刊刻《宋學士文集》，122000餘字，10個工匠52天完成，平均每個工匠每天可刻200餘字。以此推算，《三國志平話》8萬字需一個

小說傳播的「空白期」。(註4)

明代中後期，嘉靖萬曆時期（1522～1620），商業經濟的繁榮才使小說的商業化出版和社會化傳播成爲可能。

## 第一節 小說的商業化出版

小說大眾化接受的物質基礎是小說印本的規模化出版，而作爲非主流意識形態表現物的小說，其規模化出版只能有賴於印刷媒介的商業化操作；利潤是小說商業出版的決定因素，至明代中後期，商業印刷業發達後印刷成本不斷降低，小說因有利可圖而獲得大規模商業出版。

### 一、商業書坊和小說的規模化刊刻

通俗小說自誕生之日起就帶有濃重的、無法抹除的商業色彩，與書坊結下不解之緣。現存最早的話本、平話皆爲書坊所刻。書坊最早開始搜集整理和刊刻小說，不但刊行了許多單篇話本小說，而且早在元代中葉就首開書坊結集刊印話本之先例，如福建建陽虞氏務本堂在至治年間（1321～1324）刻印了《新刊全相平話五種》。明代話本小說、章回小說的興盛與前代的基礎固然密不可分，也受益於明代的文化氛圍，但書坊更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雖然印刷業受官府的控制與干預，商業化發展與其他產業不同，但明代中後期商業經濟的發達已經使印刷業成爲重要的經營行業。僅以明代最大的官方印刷機構——司禮監經廠爲例，洪武時（1368～1399）的規模是刻字匠150人、裱褙匠320人、印刷匠58人，共計500餘人；嘉靖十年時（1531）經廠擁有箋紙匠62名、裱褙匠293名、摺配匠189名、裁曆匠81名、刷印匠134名、黑墨匠77名、筆匠48名、畫匠76名、刊字匠315名，總計1275

月，《三國演義》70萬字需十個月。

(註4) 游國恩等主編《中國文學史》：「明代的小說創作，在《三國演義》和《水滸傳》出現之後，曾經沉寂了一百多年。」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年，頁103。  
《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文學》「明代文學」條：「從明初到正德年間是明代文學的前期……至於小說創作，這時幾乎是空白。」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6年，頁564～565。齊裕昆《明代小說史》：「元末明初出現《三國演義》、《水滸傳》兩部巨著，其後將近百年，小說創作幾乎一片空白。」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頁3、140。郭英德《懸置名著——明清小說史思辨錄》，《文學評論》，1999年第2期。

名，《明會典》卷一百八十九人數相當於現代的大型印刷廠。可見明代中後期的印刷出版業比之於明初有了很大的發展，規模達到了很高的程度。

商業資本的介入，使民間以牟利為目的的商業印刷出版業更為繁榮，包括出版（刻印）、發行（販賣）在內的圖書出版已經充分商品化。〔註 5〕福建建安（建陽）、四川眉山（成都）、河南汴梁（開封）、安徽徽州（歙縣）、江蘇金陵（南京）、浙江武林（杭州）、山西平水（臨汾）以及北京等地的商業印刷出版業迅速崛起，成為著名的刻書印書中心。〔註 6〕尤其經濟發達的江南〔註 7〕，由於雄厚的私人商業資本介入，出版業在全國獨佔鰲頭。〔註 8〕不僅江蘇、浙江和福建是全國有名的出版中心，而且天下三分之二的印刷商業資本都集中在蘇州和南京。胡應麟（1551~1602）《少室山房筆叢·甲部經籍會通·四》云：

凡刻之地有三，吳也、越也、閩也。蜀本宋最稱善，近世甚希。燕、粵、秦、楚，今皆有刻，類有可觀，而不若三方之盛。其精，吳為最，其多，閩為最，越皆次之；其直重，吳為最；其值輕，閩為最；越皆次之。

吳會金陵，擅名文獻，刻本至多，巨帙類書咸會萃焉。海內商賈所資，二方十七，閩中十三，燕越弗與也。然自本方所梓外，他省至者絕寡。雖連楹麗棟，搜其奇秘，百不一二，蓋書之所出而非所聚也。

印刷商業資本集中支持的書坊普遍快速發展，無論數量還是規模，都達到相當的程度。《建陽嘉靖縣志》有「書坊圖」，堂號姓名可考的書坊約 64 家。〔註 9〕南京書坊每以「三山街書林」、「三山書坊」<sup>四</sup>字樣宣傳，萬曆年間（1573~1620）達到鼎盛，多達 93 家。蘇州書坊則有

〔註 5〕葉燮元《明代江蘇刻書事業概述》，《學術月刊》，1957 年第 1 期；李致忠《明代刻書述略》，《文史》，第 23 輯；張秀民《明代南京的印書》，《文物》，1980 年第 11 期；范金民《明清江南商業的發展》，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 年，頁 41~42。

〔註 6〕葉德輝《書林清話》卷五「明人私刻坊刻書」。嶽麓書社，1999 年。

〔註 7〕江南地區，包括明清的蘇、松、常、鎮、寧、杭、嘉、湖八府。參見李伯重《簡論江南地區的界定》，《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0 年第 4 期。

〔註 8〕大庭修《江戸時代日中秘話》，中華書局，1997 年，頁 6162。

〔註 9〕謝永順《福建古代刻書》，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 年，頁 333。

37家，杭州24家，北京10餘家，徽州10家。〔註10〕周弘祖《古今書刻》著錄明版書共計470種，其中367種為坊刻本（其中多數又為嘉靖以後的產品）。

書坊刊刻以營利為目的。書坊刻書考慮市場需要與經濟效益，這決定了書坊主要將目光盯住市場，考慮什麼樣的讀物才是最受讀者歡迎的。從當時的傳播與出版後的熱銷可以看出，新興的通俗小說無疑有廣大的市場。〔註11〕出版通俗小說的可觀利潤，使通俗小說成為書坊刻書的重點。各書坊爭相物色作者，收買小說作品，書坊成為通俗小說的主要刊刻者。

書坊在正德、嘉靖年間（1506～1567）開始出版小說，到萬曆時小說的商業化規模化出版達到鼎盛。《小說書坊錄》所錄現存的225部明代小說中，有120種出於萬曆。建陽所刻66種小說中，除5種不明年代，3種是正德、嘉靖時期，3種是天啓、崇禎（1621～1644）時期，55種是萬曆間刻本。萬曆後南京蘇州書坊所刊刻小說超過以數量著稱的建陽坊本。〔註12〕小說從此進入了主要以文本形式和讀者閱讀為主的傳播時代。

## 二、商業印刷與小說的大眾化出版

印刷出版業走向商業化，首先必須具備這些條件：政府政策的支持、刊刻技術的發達和商業資本的介入。商業資本的介入已如前所述，政策的支持則體現在，洪武元年（1368）起書籍、筆、墨一律免於徵稅；《明會要》卷二十六嘉靖八年（1529）廢除工匠輪班役。明代中後期刊刻技術的發達主要體現在刻印成本的降低和刻印效率的提高。

小說的鈔刻、印刷有賴於一定的物質和技術基礎。物質指紙、墨、木材（雕版用梨、棗木），技術指工藝流程。在降低成本方面，主要是紙、墨等原料和刻工成本的降低；在效率方面，主要是刊印技術、字體、裝幀等的改進。

首先，造紙技術提高，紙張成本降低。明代是我國造紙技術的成熟時期，商業資本的介入，促進了造紙業的發展。〔註13〕紙張生產主要在兩方面

〔註10〕張秀明《中國印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頁369～372。

〔註11〕馮保善《明清小說與明清江蘇經濟》，《江蘇社會科學》，1999年第3期。

〔註12〕張秀明《明代南京的印書》，《文物》，1980年第11期。張秀明《中國印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

〔註13〕明代造紙業廣泛存在於南方和北方，江西、福建、浙江、安徽、河南、四川、湖廣、南直隸都是重要產地，而以江西、福建、浙江、安徽為中心。造紙業